

刘敞《先秦古器记》考

赵学艺

内容摘要:刘敞《先秦古器记》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轫之作,此书久已散佚,仅有同名序文一篇留存于世。对于此书的内容结构及文本体例,后代学者多根据该篇序文进行推测和想象。幸运的是,《先秦古器记》的原碑残石在清代被重新发现,当时的金石学者对残碑的具体形制进行了详细记录。通过比较宋人相关记述和残石碑文,笔者推测刘敞所撰《先秦古器记》应存在碑刻、纸本两个文本系统,二者在所收器物的范围、数量、著录体例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。

关键词:金石学 刘敞 《先秦古器记》

1918 年冬,王国维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始了他为徐乃昌《随庵吉金图》所作的序言:

私家藏器,莫先于宋刘仲原父。为古器之学及著录所藏者,亦自原父始。原父知永兴军日,得古器十有一,使工摹其文,图其象,刻诸石,名之曰《先秦古器记》。其自序中具言攻究古器之法,曰:“礼家明其制度,小学正其文字,谱牒次其世谥,乃为能尽之。”呜呼!古器之学,略尽于此数语,著录古器之法,亦蔑以进于此矣。嗣是,李伯时、吕与叔《考古图》,王楚等《宣和博古图录》,皆用其例。^①

文中提到的“原父”,即北宋金石学家刘敞,王国维在追溯吉金之学形成发展的过程时,毫不犹豫地将刘敞放在了学术史发端的地位,认为刘氏所著《先秦古器记》不仅开风气之先,其“礼家明其制度,小学正其文字,谱牒次其世谥”的论述,还从方法论的层面为后世吉金研究指明了路径。

刘敞,字原父,一作原甫,世称公是先生,生于天禧三年(1019),庆历六

^①王国维: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九《随庵吉金图序》,《王国维全集》第八册,浙江教育出版社、广东教育出版社,2009 年,第 612 页。

年(1046)进士,累官至集贤院学士、判南京留司御史台事,熙宁元年(1068)卒,《宋史》卷三一九有传。嘉祐五年(1060),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。永兴军路治所在古长安,因地利之便,刘氏在任内留心购藏青铜古器,所获颇丰^①。正是在此基础上,他完成了自己的吉金研究之作——《先秦古器记》。

《先秦古器记》(或作《先秦古器图碑》^②),一卷,宋翟耆年《籀史》^③、王应麟《玉海》^④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^⑤中皆有著录。但在南宋以后,此书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,历代官私书目中,皆罕见著录。只有刘氏为此书所作的一篇同名序文,因收入其文集《公是集》而幸存于世。《先秦古器记》是怎样的一部著作?作为发轫之作,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宋代吉金研究范式的建立?刘敞在同名序文中提出的吉金研究方法,在他著作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?这些问题的解决,都需要我们对《先秦古器记》一书有一个具体而清晰的认识。

一、《先秦古器记》碑刻考述

《先秦古器记》久佚,因此刘氏所撰写的同名序文,长期以来都是后人了解考察该书体例最主要的材料,今移录于下:

先秦古器十有一物,制作精巧,有款识,皆科斗书。为古学者莫能尽通,以他书参之,乃十得五六。就其可知者校其世,或出周文武时,于今盖二千有馀岁矣。嗟乎,三王之事,万不存一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记,圣王所立,有可长太息者矣,独器也乎哉?兑之戈,和之弓,离磬,崇鼎,三代传以为宝,非赖其用也,亦云上古而已矣。孔子曰:“多见而识之,知之次也。”众不可概,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?使工模其文,刻于石,又

①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古敦铭”条载:“嘉祐中,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,其治在长安。原父博学好古,多藏古奇器物,能读古文铭识,考知其人事迹。而长安,秦汉故都,时时发掘所得,原父悉购而藏之。”(欧阳修撰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三四,《儒藏·精华编》第206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年,第1897页)

②关于此书名称,宋人著录虽略有差异,但从卷数及各自的描述可知二者当为一书,以“图碑”名之者,则进一步强调了该书的物质载体和内容特征。清人在亲见此碑原石及拓片的情况下,多将其著录作“先秦古器记”(详见后文),当有所据,本文从之。

③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图碑》一卷。”(翟耆年:《籀史》卷上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1513册,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16页)

④“刘敞得先秦古器十有一,模其文,图其象,为《先秦古器图》一卷,又为赞。”(王应麟撰,武秀成、赵庶洋校证:《玉海艺文校证》卷二二,凤凰出版社,2013年,第1080页)

⑤“刘敞《先秦古器图》一卷。”(脱脱:《宋史》卷二〇二《艺文志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5076页)

并图其象,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。终此意者,礼家明其制度,小学正其文字,谱牒次其世谥,乃为能尽之。^①

刘敞在这段文字中,感慨经典文献中三代故事的残缺,追述了前人对于传世古器的重视。进而从自己的藏品中,挑选了11件制作精巧的先秦有铭铜器,将其器型图样及铭文摹写镌刻上石,“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”。

《先秦古器记》碑石的具体情况,宋人并无记录,后人多以为此碑早已亡失。直至清代,随着金石考据之学大兴,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残碑才被金石学家们所发现,并有多部拓本在藏家间流传。清代的这次发现,影响范围较小,基本局限于当时的几位金石收藏家之间,因此长期以来为学者所忽视。民国时期,容庚在清人张廷济、赵魏的书发现了关于刘敞此碑残拓的记录,由此才得知,此碑拓本“清嘉庆道光间犹有存本”^②。

进一步翻检史籍,笔者发现,除了容庚提及的张、赵二人,清代还有多位金石学者在其著作中著录了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残石拓本,并且至少在嘉庆年间,《先秦古器记》的原碑仍有部分残存于世。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刘敞原碑的物质形态、文本结构的还原,有了更大的可能。以下结合相关著录,进行具体考察。

在清代学人中,钱大昕是较早对《先秦古器记》碑石拓本进行著录的学者,见于其所撰《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》:“《先秦古器记》,刘敞撰,正书,嘉祐八年(1063)六月。”^③据钱氏所记,拓本上记载有刘敞此碑刊刻的具体时间,在嘉祐八年六月。刘氏任职永兴军的时间在嘉祐五年九月至嘉祐八年八月,正与拓本所载时间相合^④。据钱大昕自作年谱所载,此目录编成于乾隆四十七年(1782)^⑤,由此可知,最晚在乾隆年间,《先秦古器记》的石刻拓本

①刘敞撰,黄寿成校点:《公是集》卷三六《先秦古器记》,《儒藏·精华编》第217册,第608页。按,刘敞所撰《公是集》共七十五卷,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皆有著录,明初编《永乐大典》时尚存,后渐散佚,明清时期有多部抄本流传,皆为残本。清乾隆年间,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得《公是集》五十四卷,收入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,较诸本最为完备。儒藏整理本以武英殿本为底本,参校众本,并吸收了鲍廷博、傅增湘的校补成果,可称善本,文中凡所引用,皆据此本。

②容庚: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,《颂斋述林》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48-51页。

③钱大昕:《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》,陈文和主编: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六册,凤凰出版社,2016年,第589页。按,钱氏还著有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一书,详细考述其所藏金石拓本,但其中却并未收录《先秦古器记》。

④张尚英:《刘敞年谱》,《宋人年谱丛刊》第4册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2095、2099页。

⑤钱大昕:《竹汀居士年谱》,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一册,第30页。

已经为当时学者所发现。

随后,清人赵魏在其《竹垞庵金石目录》中,也著录了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拓本:

《先秦古器记》,嘉祐八年六月十九,刘敞撰,正书。下图所得古器十有一,今可见者七,盖当时有二石而亡其一矣。^①

关于立碑时间,赵魏记录得更加具体,在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。据前引刘敞序文记载,此碑原应著录古器 11 件,而赵氏所得拓本仅存 7 件古器,据此他推测刘敞当时可能共刻有两方石碑,至拓印此本时,或已仅存一石。

而在钱大昕的弟子孙星衍与邢澍合撰的《寰宇访碑录》中,笔者则进一步发现了《先秦古器记》原碑的身影:

《先秦古器记》,刘敞撰,正书,嘉祐八年六月。陕西长安。^②

孙氏此书完成于嘉庆七年(1802),所录多为当时存世之碑,若原石已佚,则会著明拓本所藏之处。据此,刘敞所立原碑清代中期应仍存于西安。这一点,在清人吴式芬所撰《金石汇目分编》^③及黄本骥《金石萃编补目》^④中都能得到印证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至五十一年(1786)间,孙星衍曾在陕西巡抚毕沅幕中助修典籍,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,孙氏得以亲见此碑。

关于《先秦古器记》残碑的具体情况,孙星衍并未展开论述。不过,在清人严可均所撰《铁桥漫稿》中,笔者找到了对刘敞此碑残存内容的详细描述:

《先秦古器记》 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

右《先秦古器记》,刘敞撰。碑凡四横,每横高尺七寸八分,广三尺四寸,石今断失下载,仅存二横有半,为器八,为铭五,据记文称,器十有一物,则失五铭也。其存铭五,《钟鼎款识法帖》皆摹录,而其释文多误,如:鄠即鄠字,而释为邾;殷即殷字,借为簠,而释为敦;百即首字,而释为囧;凡即凡字,而释为周。诸误不可胜指,自隶书行而古文废,千餘年来,长夜将旦,乃新定释文,以示后之治古文奇字者。^⑤

据严氏记载,《先秦古器记》原碑从上到下共分四横行,每行高一尺七寸八

①赵魏:《竹垞庵金石目录》卷四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三辑第 37 册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6 年,第 411 页。按,此条容庚误引作卷四:二八,当为卷四:二六。

②孙星衍、邢澍:《寰宇访碑录》卷六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 26 册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 年,第 19941 页。

③吴式芬:《金石汇目分编》卷十二之一西安府,光绪海丰吴重惠刻本。

④黄本骥:《金石萃编补目》卷二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 92 册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91 年,第 22 页。

⑤严可均:《铁桥漫稿》卷四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 92 册,第 209 页。

分,广三尺四寸,原应镌刻有 11 件古器的器型图及铭文。然严氏访见之时,此碑已断,碑石下截亡佚,只残留两横有半的碑文,包含 8 件器型图和 5 篇器物铭文。严氏对于《先秦古器记》残碑的记录,正与刘敞序文中所谓的“模其文,图其象”的文本体例相合。前引赵魏《竹垞庵金石目录》,曾依据其所藏《先秦古器记》残石拓本,推测刘敞此书原当刻于两方石碑上。而严氏对于原碑的这则记录,则明确推翻了赵魏的推论,使得笔者对于刘敞碑文的布局有了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。

可惜的是,《先秦古器记》仅剩的此截残碑,至道光年间,也已经完全亡佚。据清人张廷济为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所作序文记载:

刘氏《先秦古器记》存一家之器,故备为之图。其摹勒文字亦似视薛较胜。然当时上石仅十一器,今石已不存,余所得旧本止存七器。^①

根据张廷济序文后所署日期,该文撰写于道光十九年(1839),而在此时,《先秦古器记》仅存的半截残碑也已经完全不存。张氏这一记载,在清人程文荣所撰《南村帖考》中也能得到印证:

《先秦古器记》石刻凡四列,十一器,嘉庆初尚存,近刘燕庭观察官陕西,访之未获。瞿木夫丈曩赠余一拓本,下截已残缺,第一列记及二器款识,第二列三器并款识,第三列三器,其二器缺款识,其一器亦不全矣。^②

文中提到的刘燕庭即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,刘氏出任延榆绥道兵备道在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至二十五年(1845)间^③。由此可知,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残碑在嘉庆初尚存于世,而至道光年间,已彻底亡佚。另外,程文荣对于所藏拓本的描述,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此碑文本结构的认识。据程氏所载,刘敞此碑下截已亡,残拓包含记文 1 篇,器型图 8 件,铭文 6 篇(1 篇残)。其中,第一行刻记文(应即《公是集》所收《先秦古器记》序文)、2 件器型图及其铭文;第二行刻 3 件器型图及其铭文;第三行已残缺,存 3 件器型图、1 篇铭文(残)。此碑原应收器 11 件,则可以推知,丢失的第四行也当刻有 3 件器

①张廷济:《〈怀米山房吉金图〉序》,《金文文献集成》第 7 册,线装书局,2005 年,第 415 页。按,张廷济所藏《先秦古器记》残拓,在其《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》《清仪阁金石题识》中皆未见载录。

②程文荣:《南村帖考》卷二“兰亭续帖”条,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 97 册,第 587-588 页。按,程文荣所藏《先秦古器记》拓本为瞿木夫所赠,此人即钱大昕之婿瞿中溶。瞿氏精于金石考订之学,有稿本《古泉山馆金石萃编》一百六十卷,后不幸落水亡失。张均衡曾辑得残稿四卷,收入《适园丛书》,惜其中并未见录此《先秦古器记》残拓。

③胡昌健:《刘喜海年谱》,《文献》2000 年第 2 期,第 132-151 页。

物的器型图及其铭文。

通过对以上各家著录的考察,我们对于刘敞《先秦古器记》石碑的物质形态及文本体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:刘敞此碑共刻石1方,于仁宗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立於永兴军路之京兆府(今西安)。碑文分四横行排列,每行高一尺七寸八分,广三尺四寸,包含同名记文1篇,以及11件古器的器型图和铭文。其中,第一行刻录记文和2件古器的器型图及铭文,余下的第二、三、四行,每行分别刻录3件古器的器型图、铭文。宋代以后,刘敞此碑久不为人所注意。清代乾隆年间,此碑被学者关注,惜当时已残失下截,仅存两行有半。嘉庆以后,剩馀残石也彻底亡佚。

二、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

清代中期《先秦古器记》原碑的发现,只是在少数金石同好之间流传,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传统学界对于《先秦古器记》一书的认识,主要还是来自于刘敞所撰的同名序文。刘氏在这篇序文中,清楚地交代了《先秦古器记》一书的内容体例,以及刊刻方式。因此,后代学者涉及此书时,基本以序文所述为基础来展开论述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《先秦古器记》一书虽早已散佚,但它在宋代的金石典籍中却多见引用。这些在它书中留存下来的内容,在收器数量、类型、时代及著录体例等方面,都与刘敞序文和残碑所载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如宋人薛尚功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中所引《先秦古器记》,还包含有相关器物的考述及赞文,部分内容与刘敞《公是集》中留存的数则古器记文基本相同。这些内容,明显并不包含在刘敞序文所谓的“模其文,图其象”的文本结构之中。如此一来,传统上对于此书简单化的理解,在面对复杂的相关史料记载时,往往就显得左支右绌,力不从心。

部分学者在考述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文本体例时,也曾注意到薛氏引文及《公是集》中的内容。不过,由于并没有考虑到此书可能还存在一个碑刻以外的文本系统,因此,他们多将刘敞记文中提及的“模其文,图其象”,与薛氏引文所包含的说、赞糅合在了一个统一的文本系统当中,认为这些文本要素都体现在了碑刻系统之内。如容庚认为,石刻本《先秦古器记》“有图,有铭文,有说,有赞,虽已失传,尚可于《公是集》及薛氏《款识》中所引得见其四器”^①。叶国良也认为“刘敞《先秦古器图》,其书有图、有释文、有序、有赞”,接着,他还列举了《集古录跋尾》《考古图》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等书中

^①容庚:《宋代吉金书籍述评》,第50页。

的相关器物著录,来印证这一观点^①。张尚英^②、史正浩^③在论及《先秦古器记》时,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。

实际上,通过上文的考述,可以确定刘敞所刻《先秦古器记》石碑,除开头记文一篇外,所收的11件古器仅著录了各器器型图及铭文摹本,并不包含任何叙述考证类内容。因此,笔者有理由推测,在碑刻之外,《先秦古器记》应该还存在另外一个纸本系统。而伴随着物质载体的差异,两个文本系统在所收器物的数量、类别、时代跨度,以及具体的文本结构上,也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。下文结合存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,具体分析。

关于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收器数量,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》的“韩城鼎铭”“张仲器铭”两条跋文中,都有所提及:

原甫在长安,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,亦自为《先秦古器记》。^④

原甫在长安,得古器数十,作《先秦古器记》。^⑤

根据欧阳修这两条内容接近的描述,《先秦古器记》这一纸本系统,共收录了古器数十件,多于碑刻系统11件的著录数量。

据史籍记载,欧阳修与刘敞相交甚笃,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。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中所收铜器铭文,多数来自刘敞的寄赠。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四八保存了28篇欧阳修寄给刘敞的书简,其中,古器铭文作为他们共同的爱好,经常成为书信往来的主题。刘敞多次将他新获古器的铭文拓本以及考释内容寄送给欧阳修,而欧阳修甚至将家存《集古录目》的唯一稿本寄给刘敞,供其阅览。因此,从二人学术交流的紧密度来看,欧阳修对于《先秦古器记》收器数量的描述,应该是有很高可信度的。

关于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所收铜器种类,宋人蔡绦在其《铁围山丛谈》中有所述及:

初,原父号博雅,有盛名,曩时出守长安。长安号多古簋、敦、镜、甗、尊、彝之属,因自著一书,号《先秦古器记》。^⑥

根据蔡绦的记载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可能包含了簋、敦、镜、甗、尊、彝等器类。其中镜、甗、尊类皆不见于可考的《先秦古器记》碑刻之中。特别是镜类,据刘敞记文所述,《先秦古器记》碑石所收皆为先秦有铭古器,而汉代以

①叶国良:《宋代金石学研究》,台湾书房,2011年,第60页。

②张尚英:《刘敞著述考述》,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12辑,线装书局,2003年,第298-316页。

③史正浩:《宋代金石图谱研究》,河南大学出版社,2017年,第71页。

④欧阳修: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韩城鼎铭”条,第1900页。

⑤欧阳修: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张仲器铭”条,第1909页。

⑥蔡绦: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79页。

前,基本未见铜镜有铭文者,这一点宋人亦有正确的认识,徽宗朝所编《宣和博古图》为现存最早研究著录铜镜的著作,其所录铜镜即从汉代始。因此,可以推测,相较于碑石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收录的器物种类及年代可能都更加广泛。

这一点,在宋人薛尚功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的引文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。薛氏书中的引文,是了解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内容体例的重要材料。在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一书中,薛氏多次以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曰”的形式,直接将刘敞的考述原文摘录在相关器物条目之下,因此,这些内容可以确定出自刘敞《先秦古器记》原书。而《先秦古器记》原碑只有器型图及铭文,并不涉及器物考证,因此,薛氏所引的这些文字显然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系统。通过对薛氏引文的分析,我们可以确认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所收古器,无论从器物年代,还是器类上,都超过了碑石的著录范围。

以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九著录之莲勺炉为例,薛氏于此条目下,详细引用了刘敞对该器的考述:

按,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:“右一器,上为山,下为盘,世俗谓之博山炉,然按其刻曰‘莲勺官铜一斗鼎’,非博山者。莲勺则宣帝居民间时尝困处也,至今栢阳界,去长安七十馀里,疑汉于其地亦有离宫。刻又云:‘五凤三年五月己丑,工渭成徐安、守属定昌造’”。^①

此器原为刘敞旧藏,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中亦有所论及^②。薛氏此条引文,明确标明出自《先秦古器记》,可知此器曾被收入该书。在引文中,刘敞根据器身铭文,将此件器物考释为汉宣帝五凤三年(前55)所造。由此可知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亦收录汉器无疑。可见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虽同样名之曰“先秦”,但其所收器物的年代,并不完全限定在先秦时期,个别已下探到三代以后。

另外,通过分析薛尚功所引《先秦古器记》原文,我们对于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内容体例和文本结构,也可以有一个直观的了解。以刘敞所藏的张仲簠^③为例,此簠共一对,刘敞得之于长安附近的白鹿原,其铭文见载于薛氏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五,薛氏于该器条目下,直接摘抄了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相关考述:

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:“右二簠,得于骊山白鹿原。簠者,稻梁

①薛尚功: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九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409页。

②欧阳修: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前汉二器铭”条,第1916-1917页。

③按,根据宋人所录铭文,此器当释作弭仲簠。文中为与刘敞原文相对应,仍袭用其旧称。

器。其铭曰‘张仲’，见于《小雅》，宣王臣也，所谓‘张仲孝友’者矣。赞曰：宣治中兴，方虎董征。张仲孝友，秉德辅成。或外是经，或内是承。文武师师，安有不宁。”^①

在薛氏摘引的这段记文中，刘敞记录了器物的出处信息，并结合传世典籍，对其器类功用、铭文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。在此之后，则是一段四言韵文组成的赞文。薛氏书中所引诸条《先秦古器记》，多由一节考释器物及铭文的记文和一段文学性的赞文组成。同样，在今存《公是集》辑本中，也保留了多篇关于古器的考释记文及赞文，与薛氏引文的文本结构基本相同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文本构成。

除了记文、赞文外，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是否还包含有其他类型的内容？我们可以通过现存文本内容来试着进行推测。上文“张仲簠”一条中，薛氏所引刘敞记文，只是对器铭中涉及的字词人物进行了考述，并结合传世文献来推测其年代。根据文意推测，刘敞原书在记文之前，或当著录有张仲簠二器的完整铭文释文，这样，记中引文才有所指归。另外，此条记文开头“右二簠”的表述，以及连勺炉条起始“右一器，上为山，下为盘”的描述，也暗示原书在铭文考释之前，可能还附有该器的器型图样。

张仲簠的记文、赞文同时也收录于《公是集》中，其内容与薛书所引略有差异，或更接近《先秦古器记》原文：

右二簠，得于骊山白鹿原。簠者，稻梁器，其铭曰张仲云云，张仲见于《小雅》，宣王臣也，所谓“张仲孝友”者矣。簠书奇字，不能尽识，当有能辨者。赞曰：宣治中兴，方虎董征。张仲孝友，秉德辅成。或外是经，或内是承。文武师师，安有不宁。^②

文中“簠书奇字，不能尽识，当有能辨者”一句，表明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在此段文字之前，应该还著录有张仲簠二器的铭文摹本。

总结以上，笔者推测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应收录古器数十件，器类广泛，年代也并不以先秦为限。各器条目下，包含有各器器型图样、铭文摹本、释文、考释记文、赞文。

此处应该警惕的是，试图单纯依靠薛氏引文和《公是集》中的残篇，来完整复原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文本结构的想法，是存在一定风险的。首先，薛氏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并不收录器型图样，因而限于其体例，此书可能只部分摘引了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文字考释内容。其次，今本《公是集》主体是由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得的残本，其中涉及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的内容，

^①薛尚功：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五，第296页。

^②刘敞撰，黄寿成校点：《公是集》卷三九，第787页。

先是从《公是集》中被按韵拆分于《永乐大典》诸册之中,后来又被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重新编排,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造成相关文本结构的变形。这些文本流动的过程,势必会对我们还原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文本系统的努力造成很大的影响。

另外,本文依据现存诸书中的内容而对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内容及体例进行的考述,只是在结合相关史料之上的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,而历史往往是复杂而多层次的,远不是一个单一的结论所能涵盖的。因此,上文对于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文本结构的还原远非定论。

值得思考的是,对于此《先秦古器记》纸本系统的考察,我们只能从《公是集》部分残篇和宋人其他典籍的引述中获得蛛丝马迹,而在现存的刘敞传记资料当中,却无法发现任何直接的记载。《宋史》刘敞本传中,谓其“长于《春秋》,为书四十卷”,并未提及具体著作^①。刘敞在为其兄所撰的行状中,详细罗列了刘敞的各部著作,甚至连尚未成书的《易外传》《元滋》《通古》《古风》诸书也一一载录,却并未提及《先秦古器记》^②。刘敞墓志铭为欧阳修所撰,文中亦详细罗列了刘敞的各部著作,而欧阳修在《集古录跋尾》中两次提及的《先秦古器记》,在刘敞墓志铭中却并未载录^③。在现存的刘敞行状、墓志铭、本传当中,都完全没有《先秦古器记》的记录。

个中缘由,刘敞在其行状中的一段记载,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:

在长安时,得三代时钟鼎器皿数十,皆有篆刻铭识,文字奇古。公按读之,因以考知前代制度,用匱敦簠簋,与前世学者所说不同。其所言齐黄同冕,亦书传所不载也。公珍惜之,尝曰:“我死,子孙以此烝尝我。”及病累年,尝使子弟诵书其侧,时阅古器以自适。尝叹曰:“我所著书,皆圣人微旨,而不及尽有成,岂非天哉!”^④

根据刘敞这段文字中的记载,刘敞在病榻前鉴赏古器的时候,仍在叹息其所著相关典籍,来不及完全成书,大概是天意如此吧。由此推测,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各篇是在刘敞生前陆续写成,但该书在刘敞去世前并未完全编纂成书。其后,这些篇目被收入《公是集》中,得以流传于世。据祝尚书考证,《公是集》最早刊刻于哲宗绍圣年间,由刘敞之子刘奉世刊于成都,是为“蜀本”,

①脱脱:《宋史》卷三一九,第10387页。

②刘敞撰,逯钦立点校:《彭城集》卷三五《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》,齐鲁书社,2018年,第917页。

③欧阳修撰,李逸安点校: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三五《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》,第566-570页。

④刘敞撰,逯钦立点校:《彭城集》卷三五,第917页。

也是该书在宋代的唯一刻本^①。薛尚功等人所引用的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，应当即出自此本。

综合以上考证，本文认为，刘敞所撰《先秦古器记》存在碑刻和纸本两个文本系统。仁宗嘉祐八年（1063），刘敞将所藏 11 件先秦古器的器型图和铭文镌刻上石，并刻《先秦古器记》一文于前，是为碑刻系统。而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所收器类则更加广泛，年代也并不以先秦为限，各器条目下，包含有器型图样、铭文摹本、释文，以及详细的考释记文和赞文。

附：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辑录

今存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中的相关考述内容，主要见录于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、薛尚功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及刘敞《公是集》中，今将诸本中确定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者辑录于下。

1. 韩城鼎（晋姜鼎）

释文：惟王九月乙亥，晋姜曰：“余惟司朕先姑君晋邦，余不□安宁，丕黜明德，宣□我猷，用□所辞辟□□□□剿虔不□□□□ 宠我万民，嘉遗我，锡卤赉千两。参瀼文侯□□□□□征绥□□坚久吉金，用作宝尊鼎，用康醑受怀远邦君子。晋姜用蕲□□麋寿作惠○亟，万年无疆用德，峻保其孙子，三寿是利。”^②

此鼎得于韩城，韩者，古建国。有晋姜，有文侯，殆曲沃宗庙器也。复作赞曰：“文侯翼周，乃锡彤弓。姜氏载德，既祐武公。并国享晋，维政之隆。帅服刺仇，非议之中。”^③

按，《集古录跋尾》于此器条目下，收录两种释文，并在此段释文后，明确标明“右原父所写如此”，可知此段释文为刘敞所作。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在此段考述及赞文前标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”，可知此段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。

2. 毛伯敦（邠敦）

《史记》武王克商，尚父牵牲，毛叔郑奉明水，则此铭谓郑者，毛叔郑也。铭称伯者，爵也，史称叔者，字也。敦乃武王时器也。^④

按，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四著录此器作“邠敦”，并于该器下注

①祝尚书：《宋人别集叙录》卷六《公是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276页。

②欧阳修：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韩城鼎”条，第1900页。

③薛尚功：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“晋姜鼎”条，第194页。

④欧阳修：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古敦铭”条，第1897页。

明:“《先秦古器记》刘原父所藏。”可知该器原应收录在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中。《集古录跋尾》著录作“毛伯敦”,并在此段考述前谓“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”,可知此段考述,或为刘敞为毛伯敦所作记文。

3. 伯罔敦

此二敦得于蓝田。敦者,有虞氏之器。《周礼》有金敦,有玉敦,玉敦以盛血,天子以盟诸侯;金敦以盛黍稷,大夫主妇以事宗庙。此金敦也。其铭曰:“伯罔父作周姜宝敦,用夙夕享,用祈万寿。”盖穆王太仆正,周畿内诸侯,食菜于周者,皆周公之后,然则伯罔,周公裔孙也。赞曰:“穆王眊荒,周巡天下。祭公作招,实止王过。罔亦正仆,其僚遵度。铭器贻世,似续妣祖。载祀二千,示我懿矩。”^①

按,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于此段考述及赞文前,有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”,可知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。此段记文、赞文,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亦有收录,文字略异^②。

4. 叔高父煮簠

右一器,其铭云:“叔高父作煮簠,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其容四升,外方内圆而小埴之,望之略似龟,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。今礼家作簠,内正圆,外方正,刻盖正为龟形,犹有近也,不全与古同耳。^③

按,《集古录跋尾》谓刘敞于长安得此器,“模其铭以见寄”,并明确说明此段考释为“原父所书”,则此段考述或为刘敞为叔高父煮簠所作记文。

5. 张仲簠

右二簠,得于骊山白鹿原。簠者,稻梁器,其铭曰张仲云云,张仲见于《小雅》,宣王臣也,所谓“张仲孝友”者矣。籀书奇字,不能尽识,当有能辨者。赞曰:“宣治中兴,方虎董征。张仲孝友,秉德辅成。或外是经,或内是承。文武师师,安有不宁。”^④

按,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于此段考述及赞文前,有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”,可知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。此段记文、赞文,《公是集》亦有收录,文字略异,此处用《公是集》本。

6. 张伯匱

①刘敞:《公是集》卷四九“伯罔敦序并赞”,第787页。

②如“周公之后”,薛本作“周家之后”;“穆王眊荒”,薛本作“穆满眊荒”;“祭公作招”,薛本作“祭公作括”(薛尚功: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三“伯罔父敦”条,第240页)。

③欧阳修: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一“叔高父煮簠”条,第1905-1906页。

④刘敞:《公是集》卷四九“张仲簠赞并序”,第787页。

按,其铭曰“张伯作旅匱”,张伯不知何世人,似亦张仲昆弟矣。匱者,盥器,其形制可以挹,可以泻,足以效其用。赞曰:“伯也何人,不见《诗》《书》。仲友其兄,此之谓与。矫矫宝臣,龙角虎躯。礼之象类,可得求诸。”^①

按,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于此段考述及赞文前,有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”,可知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。

7. 莲勺炉

右一器,上为山,下为盘,世俗谓之博山炉,然按其刻曰“莲勺宫铜一斗鼎”,非博山者。莲勺则宣帝居民间时尝困处也,至今栢阳界,去长安七十馀里,疑汉于其地亦有离宫。刻又云:“五凤三年五月己丑,工渭成徐安守属定昌造。”^②

按,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于此段考述前,有“刘原父《先秦古器记》云”,可知出自纸本《先秦古器记》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学艺,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吉金文献、古器物学。

^①薛尚功: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二“张伯匱”条,第227页。

^②薛尚功: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卷十九“莲勺炉”条,第409页。